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知识的命运

THE FATE OF KNOWLEDGE



[美] 海伦·朗基诺 著

成素梅 王不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知识的命运

THE FATE OF KNOWLEDGE



[美] 海伦·朗基诺 著
成素梅 王不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的命运/(美) 海伦·朗基诺
(Helen E. Longino)著;成素梅,王不凡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0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书名原文: The Fate of Knowledge
ISBN 978-7-5327-7282-7

I. ①知… II. ①海… ②成… ③王… III ①科学研究 IV. ①G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2074 号

The Fate of Knowledge

Copyright © 2012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la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受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科学技术哲学创新学科”项目资助)

图字: 09-2005-1139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知识的命运

[美] 海伦·朗基诺 著
成素梅 王不凡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4 字数 210,000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ISBN 978-7-5327-7282-7/B·424

定价: 68.00 元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选收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界各主要流派影响较大的著作。通过有选择的译介，旨在增进文化积累，拓展学术视野，丰富研究课题，为了解和研讨现代西方哲学提供系统而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以利于我国理论界、学术界深化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批判。

——特别献给我的哲学老师——

Sue Larson

Aaron Sloman

Stephen Barker

Peter Achinstein

Marjorie Grene

中文版序言

本书被看成是对科学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重要观点从概念上进行哲学考察。它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认真对待社会学家和其他文化学者关于科学的经验研究的结果，我们的知识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在第一本著作《作社会知识的科学》一书中，阐述了对科学客观性的社会叙述，当作是关于价值在科学中起作用的建设性的思维方式。从这种叙述的有利的角度点来看，在所谓的科学大战中，哲学家与科学社会学者之间的争论，似乎对我来说，并没有抓住要点。双方依然聚焦于个人和个人知识。我反而认为，从科学社会学家吸取的重要教训是，科学探索是一项集体的活动。它是一项需要互动与批评的活动，而且，这些天里，它的特点越来越是，认知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使不同专长领域专家都来审查科学问题。对哲学家提出的挑战是承认，这种社会维度，尽管尊重规范维度，但需要内含在“知识”的概念中。

因此，本书首先表明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如何假定了理性与社会之间的二分。合理性和社会性被认为是相互排斥的，这表明，双方都完全承诺了作为个体的认识主体本来固有的知识观。这种讨论围绕三种不同的知识概念来建构——作为生产（内容）的知识，作为认知主体状态的知识，以及作为内容（知识有什么意思）的知识——因为在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中间的论证倾向于在这些不同的含义之间犹豫不决。但是，一旦解构理性—社会

的二分,在一种意义上,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分就成为一条途径,而这条途径有可能会被人们所忽视。

本书接着表明,一旦摘除个人主义的眼罩,核心的科学认知活动——观察与推理——最好被理解为是社会活动,而不是社会因素干扰的抽象地想象的认知成就。甚至真理得到一种新的分析,恰好正如聚集在确证概念的保护伞下的语义成功的概念家族之一那样。本书重新讨论了关键的非充分决定论证,在我看来,这是需要在赞成社会叙述时拒绝个人认识论的一个支柱。这里的要点不是,直接表明转向知识的社会叙述的必要性,而是考虑对这个论证揭示的背景假设的依赖,如果我们继续保留科学探索是客观的、科学探索能够提供知识的观点,这样一种转向是必要的。知识在社会叙述中幸存下来,但必须被理解为有偏见的、暂时的和多元的。人类科学探索的成功是集体的成功,是我们相互依赖的一个标志,并尽可能受天才的影响。

我感激许多对话者,感谢他们对本书观念的质疑,感谢他们对这些观念的建设性的评论,感谢他们激励我继续思考这些观念。我特别感谢成素梅教授和她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同事就这些观念展开的令人鼓舞的交谈,感谢她和她的博士生王不凡同学接受把本书从英文版翻译为中文版的挑战。我很高兴本书将会得到一批新的读者,因而我希望,与中国学术界的学者继续进行对话。

海伦·朗基诺

2016年6月美国加州

序言和致谢

ix

本书的面世是许多学术互动和有利条件的结果。它开始于一项富有雄心的计划：重新阐述知识的社会性论点，抵御对它的批评，然后，把这一论点应用于新的案例研究，包括讨论在西方反对或袒护科学与新兴的工业化后殖民社会中的科学进路之间的关系。最终，越来越明确的是，这一哲学论点需要得到更多的阐述，而这一计划的另外两个部分还有必要且值得进行较长篇幅的单独论述。总之，本书是第一部分：重新确认识识的社会性论点，这被我遇到的很有帮助的深受启发的批评所淡化，而它的发展关系到科学的社会理论中新近的其他工作，既包括经验工作也包括哲学工作。

我很感激个人和机构赋予的鼓励和提供的机会。肯·沃特斯(Ken Waters)阅读了每一章并进行了评论，有时，数易其稿。我们关于哲学和生物学争论的影响贯穿于本书。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和理查德·格兰迪(Richard Grandy)分别阅读了全部手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修改建议。这三位朋友和同事以慷慨的批判精神来响应这项工作，我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不能由于本书现存的缺陷而责备这些读者，相反，本书的优点肯定多半归功于他们。此外，1999年春天，“哲学8660”研究生讨论课的学生们阅读了本书的大部分初稿。除了整个研讨课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机会，让一群见多识广的读者检验这些观念之外，他们的个别异议也在文本中加以注释。

书中的许多观点都是与他人的对话或通信的结果,其中有保罗·博戈西昂(Paul Boghossian)、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n)、南希·卡特赖特(Nancy Cartwright)、阿米塔·查特吉(Amita Chatterjee)、J.理查德·克里斯(J. Richard Creath)、约翰·杜普雷(John Dupré)、凯瑟琳·埃尔金(Gatherine Elgin)、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詹姆斯·格里塞默(James Griesemer)、詹妮弗·霍恩斯比(Jennifer Hornsby)、唐·霍华德(Don Howard)、伊尔凡·哈比卜(Irfan Habib)、伊夫林·福克斯·凯勒(Evelyn Fox Keller)、菲利普·基切尔(Philip Kitcher)、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凯瑟琳·列侬(Kathleen Lennon)、伊丽莎白·劳埃德(Elisabeth Lloyd)、简·梅恩沙因(Jane Maienschein)、瓦莱丽·曼娜(Valerie Miner)、西法丽·莫埃特拉(Shefali Moitra)、林恩·H. 尼尔森(Lynn H. Nelson)、德鲁弗·雷纳(Dhruv Raina)、阿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罗伯特·理查森(Robert Richardson)、史蒂芬·希弗(Steven Schiffer)、弗雷德里克·施密特(Frederick Schmitt)、米里亚姆·所罗门(Miriam Solomon)、伊丽莎白·斯佩尔曼(Elizabeth Spelman)、沙伦·特拉维克(Sharon Traweck)、维维安·韦尔(Vivian Weil)、威廉·威姆斯特(William Wimsatt)、艾莉森·怀利(Alison Wylie),以及我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同事们,约翰·比蒂(John Beatty)、罗恩·吉尔(Ron Giere)、杰弗里·赫尔曼(Geoffrey Hellman)、史蒂芬·克勒特(Steven Kellert)、戴维·麦卡勒姆(David MacCallum)、迈克尔·鲁特(Michael Root)、帕蒂·罗斯(Patti Ross)、韦德·萨维奇(Wade Savage)和内奥米·谢曼(Naomi Scheman)。无疑,我忘记了许多澄清我的思路的其他交流。在此,我向那些曾向他们学习过但未列入上述感谢名单

的人致歉。

我感谢莱斯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为我提供研究和学术休假的机会,使我能够开始,然后,持续地推进这一计划。在1993—1994年和1994—1995年期间,明尼苏达大学的迈克尔与彭妮·温顿访问学者项目(The Michael and Penny Winton Visiting Scholars Program)使我减少了教学负担和暂时摆脱了行政事务。1994年夏天,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下,我在贝拉焦的塞尔贝罗尼别墅里居住的一个月,成为关键的转折点。1998年冬春之际,伦敦经济学院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哲学中心提供了热情款待与合作机会。国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SBR 9731088)资助我进行的研究,除了在不同场合有所报道和将会有所报道之外,全部纳入本书之中。在1998年、1999年和2000年,麦克奈特基金(McKnight Foundation)的人文学科研究奖为研究助理提供了资助。明尼苏达科学哲学中心的史蒂夫·列利丘克(Steve Lechuk)在关键时刻提供了技术援助。萨拉·霍金格尔(Sara Hottinger)和伊丽莎白·伦斯特鲁姆(Elizabeth Lunstrum)在担任研究助理的角色时,在最后汇总参考文献和编排索引方面,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最后,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对这一计划一如既往的鼓励,他们是,安·沃尔德(Ann Wald)和伊恩·马尔科姆(Ian Malcolm),沃尔德后来去了其他国家,马尔科姆在最后阶段能够把压力和耐心恰当地融合起来。

我的母亲和姐妹们,海伦·奥布莱恩·朗基诺(Helen O'Brien Longino),米歇尔·朗基诺(Michele Longino)和弗吉尼亚·乔丹(Virginia Jordan)始终如一地给予帮助;比尔(Bill W.)和他的朋友们不断地为我建言献策;还有我的伴侣,瓦莱利·迈纳(Valerie Miner),使得整个人生成为一场冒险。

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有几章内容是对过去著作的某些部分的重新编排。我感谢“知识在科学的社会理论中的命运”和“生物多元论的认识论”两篇文章的出版者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些文章的修订版,前一篇文章收录在弗雷德里克·施密特主编的《社会化认识论:知识的社会维度》(托托瓦,新泽西: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后一篇文章收录在理查德·克里斯和简·梅恩沙因主编的《认识论和生物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我也很感谢国家女性艺术博物馆,允许我使用由玛丽亚·埃莱娜·维耶拉·达·希尔瓦(Maria Helena Vieira da Silva)的《小镇》这幅画作为本书的封面。

目 录

001	中文版序言
001	序言和致谢
001	第一章 导言:理性—社会的二分
015	第二章 认真对待科学的社会研究
055	第三章 哲学家的回应
101	第四章 分解理性—社会的二分
127	第五章 社会化认知
161	第六章 社会化知识
187	第七章 澄清与回应
225	第八章 多元论和定域认识论
261	第九章 结论
275	参考文献
287	索引
315	译后记

第一章

导言：理性—社会的二分

《知识的命运》探讨当前科学哲学中两种转向的认识论结果：越来越认可科学探索的社会特征和越来越承认在不同科学领域内说明的多元性。社会性和多元性，尽管还没有得到普遍的支持，但已经被关心阐述当前科学实践的哲学家们所提出。考虑到认识论思想和形而上学思想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两个论点，即使很微妙，但也有重要的相互关系。本书聚焦与探究的社会性相关的认识论关注，不过，作为一个应用方向，也讨论对于科学知识的社会进路的科学多元论的意蕴。

在这本书中，我的目标是，响应“知识”术语的规范用法和产生科学知识的社会条件，提出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叙述。在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内的新近工作，对这两个方面都各有强调。结果，有意阐明我们的概念的规范维度的那些叙述——即阐述知识与诸如真理、谬误、意见、理由和辩护之类的概念之间的关系——都未能抓住现实的科学，而对科学探索的实际事例的详尽叙述已经暗示了，要么我们通常的规范概念与科学无关，要么科学没有经受好的认知实践的检验。这不可能是正确的。下面几章对这种僵局提供一种诊断和一种可替代的叙述。我认为，这一僵局是由争论双方所接受的理性与社会二分的理解造成的。

- 在一方面是理性的(或认知的)与另一方面是社会的这两者之间的二分,既构成了(1) 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实践者与哲学家之间的分歧,也构成了(2) 他们所提供的对科学知识的建构(或解构)的叙述。认知的合理性和社会性之间的二分,是在把两者明确地看成是互相排斥的时候才产生的。根据对这些概念的二分理解,如果一种认知实践在认知上是理性的,那么,它就
- 2 不可能是社会的。反之,如果一种认知实践是社会的,那么,它就不可能在认知上是理性的。^①不同的学者对“理性的”或“认知的”和“社会的”进一步含义的理解是不同的。概括地说,理性的或认知的进路,是在叙述科学判断时,聚焦于证据的或辩护的诸理由的那些进路。相比之下,社会(或社会学)的进路,要么关注非证据的(观念的,专业的)考虑,要么关注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而不是关注在叙述科学判断时的可作为证据的那些理由。我的一部分任务是阐明关于认知合理性和社会性的诸假设,对科学的许多思考者来说,这些假设使得这种二分非常有说服力。我断言的社会叙述对于包括科学的全部认知过程在内的科学认识论来说是必要的,拒斥这些假设将会为这样的社会叙述开辟一条路径。^②

① 我用“在认知上是理性的”(cognitively rational)和“认知的合理性”(cognitive rationality)来区分这里讨论的合理性与实用的合理性(pragmatic rationality),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把实用的合理性理解为不包括社会的因素。

② 希拉里·科恩布里思(Hilary Kornblith, 1994)承认这种二分法的部分趋势。他注意到一种趋势:就社会学家而言,忽视乃至嘲笑说明信念 p 时 p 为真的作用。他把这种趋势诊断为是由他们的这种假设造成的:成功的社会说明从根本上自动地破坏了与真理相联系的那些说明。科恩布里思认为,在这两种说明之间没有必然的不一致。然而,他没有对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不赞成的相反假设作出评论。如果我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假如与真理相联系的说明和社会说明之间有一种真正的整合,对于必须拒绝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诸观点来说,就存在一种共享的深层结构。

本书的论证显然指向科学知识,然而,也有理由看成包括一般的知识,或者,至少包括一般的经验知识。首先,这种论证所依赖的科学认知要素——观察和推理——是一般的经验认知的诸要素。而且,尽管在科学认知和一般的经验认知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但是,它们与涉及知识归属(*ascription of knowledge*)的规范性议题无关。第二,社会学研究者已经证明,科学家之间是相互依赖的,无疑,这种相互依赖性是所有认知行动者的一个特征。最近,许多哲学家认为,对证据的依赖贯穿于我们的日常认知生活中。^①我们依赖于汽车修理工、电脑顾问、管道工、医生、历史学家、特指的各类专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并把它们编织进我们的信念结构中。而且,我们作为认知者,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系列复杂假设,它们强化我们的大多数世俗信念,以至于几乎成为我们推理能力的组成部分。^②日常知识是,我们在对所重视的各方面的经验作出判断和推理时运用常识的问题。科学研究是拓展我们已有的知识、检验新的提议、有时是颠覆常识的问题。常识的假设和认证各类专家的机构由来已久,所以,超出了支持科学推理的假设所需要的那种批评审查。尽管如此,逻辑结构是类似的,而且,有人强调世俗的背景假设在我们的日常认知生活中发挥了作用,如果这些人是正确的,那么,对科学知识本性的论证,就关系到理解日常经验知识的特征与可能性。

3

① 参见 Coady 1992; Hardwig 1985, 1991; Kornblith 1987, 1994; Schmitt 1988。

② 阿曼达·维泽达姆(Amanda Vizedom, 2000)简要地讨论了旨在模仿日常推理的一个人工智能(AI)项目。Cyc[®]提出,以往的AI项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对日常推理所依赖的‘常识假说’的存储”(Vizedom, 1987)。Cyc[®]的一部分项目包含辨认那些假说和把它们输入Cyc[®]知识库。更多信息可以访问Cycorp网页:<www.cyc.com>。

前 辈

并不是探究科学或知识的社会性维度的那些当代哲学家，率先断言了知识的社会性。19 世纪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John Stuart Mill) 和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Charles Sanders Peirce)、20 世纪的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对形成本书部分叙述的知识或科学的社会趋向都有所强调。密尔和皮尔士写了大量有关科学、逻辑和方法的作品，但他们也注意撰写在某些方面能反映那些知识探究者实际情况的知识和真理的作品。密尔在《论自由》一书的“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那一章中讨论的基本前提，建立在人类认知者的可错性的基础上。^①皮尔士强调个体认知者的可错性，并提供了一个强调研究者共同体的真理定义。^②波普尔接受的批评来自更抽象的考虑：他关于归纳和相应地强调证伪作为科学方法的观点。^③

密尔的论证出现在他关于自由的社会和政治主题的文章的语境中，而不是出现在他的逻辑和方法论著作的语境中，而且，
4 他举的例子主要涉及宗教信仰和社会政治信念。但是，对有关天文学和化学的早期争论的简短提及，和他的论证的最一般特征表明，他有意把他的评论应用于对知识或真理的任何一种断言。他推荐的彻底的思想自由和不受约束的表达自由的四条理由，都依赖于假定人类个体的认知是有缺陷的这一事实：束缚思想及其表达的那些人，可能会犯错，而且，真理掌握在其思想

① Mill 1859.

② Peirce 1877, 1878. 所有的引文都引自 Philip Weiner 主编的皮尔士文选 (1958)。

③ Popper 1968.

受人谴责的那些人手中；即使束缚思想的那些人，也拥有真理，但是，(1) 这不可能是全部的真理，而且，不管怎样，谁都没有理由断言确然性(certainty)；(2) 如果没有相反意见，即使是真的学说，也会失去意义和理由。也就是说，密尔认为，批评讨论思想的实践和无限制的机遇，是确保我们确实具有(真)信念的正当性和克服只在单一观点的语境中形成的信念或见解的错误或不完备性的必要条件。^①例如，在其他许多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持有经验论的形式，但我们的看法也会不尽相同。尽管如此，在为了知识的完整而进行批评互动的必要性方面，密尔的观点和我所辩护的观点是一致的。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关于知识的社会性维度的论证与密尔的依据有点不同。虽然他也相信个体的人类认知者会有缺陷，但在他所提供的实在和真理的貌似一致的理论背后，隐含了他的实用主义的意义理论。我之所以说“貌似”是因为，似乎对我来说，他的确切观点受制于各种不同的解释，基于这些不同的解释，其他不同的评论与对真理的评论被相提并论。他在“如何使我们的观念变得清晰”这篇文章中有句名言：“最终注定被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的见解是我们所说的真理，而且，所表征的对象是真实。”^②这个定义被奉为例示了参照那些“效果”来定义概念的实用主义原则：“可以相信，效果具有实践关系，我们设想我们概念的对象具有这些效果。”^③从长远来看，无论什么样的见解在所有思考它的人那里都能成功地达成一致，就具有如此

① 密尔的论证举例说明了洛林·达斯頓(Lorraine Daston, 1992)讨论客观性的许多作品的道德色彩。

② Peirce 1878; 1958, 133; 所有的引文引自 Wiener 主编的皮尔士文选(1958)。

③ Peirce 1958, 124.